

的“女性”，以及通过赋予这种差别以社会和文化意义而被他律性区别形成的“女性”在概念上被区分开来了。前者的“女性”是作为“性”的“女性”，后者的女性则是如20世纪80年代I·伊里伊奇等作为“性别”加以定义的“女性”。³⁹当然这是因“男女”间建立了共同相互关系性（共同主观性）才创造出了“女性（gender）”。就是说不仅是“女性”，“男性”如果没有与“女性”的“相对性”关系意识，就不可能作为“男性”存在。⁴⁰

这种男女间的“相对性”关系意识中“女性”受到歧视的过程，按照波波瓦尔的观点，就是通过“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强迫像客体那样存在的产生过程。⁴¹

比起“主体”可以作为对“客体”进行有意识行为的存在，“客体”却无法对“主体”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或者被看成是不被允许进行有意识行为的存在，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成为“主体”的一方对被塑造成“客体”的一方保持优越性就是因此产生的。

重要的是，围绕着“性”在“性别”上产生的男女间歧视性的“共同主观性”，并不是从这种意识的外部通过强制得以维持和固化的，相反，这种歧视是男女间在相互意识方面进行相互了解后才得以持续和稳定的。

必须承认，和上述“性别”的性质基本一样的构造在东方主义中也一目了然。也就是说，西方和东方之间相互存在的“共同主观性”所产生的歧视意识构造不仅仅是靠政治、军事压制得以维持的，更多的是通过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得以维系的。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里，上述东方主义意识构造从明治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

（4）现代中国学与东方主义

前面我们提到了竹内的主张：“（日本人）自己没有问题，就去（中国），什么也看不清”。实际上这就是为了自觉认识到中日间存在的这种包含东

方主义差别构造的“共同主观性”而提出来的。可以说，竹内的方法论就是主张“在现在的日本中看现代中国”，反过来也就是强调“在现代的中国里看现在的日本”。

像这样用中国的镜子照日本、用日本的镜子照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就在于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两者的“共同主观性”构造之上。正是这种“共同主观性”才使得中日两国的“世界与世界认识”因两国官民间的相互意志而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日本战后的发展就与中国战后的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战后日本从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中得到了很多的“实惠”。日本选择了在复兴和安全上追随美国的道路，也就意味着同时选择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的政策。如果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缺乏对日本战后发展的洞察，对中国战后的历程也就很难有本质理解。换句话说，当然可能存在通过对中国战后发展的省察来寻求理解日本战后发展之本质的方法。

沟口雄三评价竹内好时称其“假赞中国之虚行评日本之实”。这实际上揭示了竹内的方法论特点，即竹内试图在中日两国间建立在对方内部观察自己的“共同主观性”构造。

问题在于，从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日本和中国都是被“歪曲”了的。就是说连接日中两国的“共同主观性”构造中，包含了妨碍认识“客观性”的“歪曲”。“歪曲”首先来自于大部分日本人并没有看到、没能看到自己战后的发展是与中国战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产生“歪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在评价亚非世界的时候，其历史观具有严重的“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倾向，就是一国的发展首先是由其国内各种条件和要素决定的。这种“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特征并不关注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实存在的“共同主观性”的构造。

这种“一国自律性发展论”很容易导致产生对日本近现代史和发展中国家近现代史的以下评价。即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很好地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和推行欧化政策，才取得了

现代化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具备了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内在条件，比如自主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以及普及基础教育引入开明精神等。但是以中国为首的亚非世界却过于拘泥于传统，导致了欧化政策的失败和现代化进程的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缺乏近现代现代化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和主体性的条件。因此亚非世界被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个原因在于，日本人由于拥有片面强调“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历史观，所以将日本自己定位于历史的“主体”，同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世界（东方）定位于历史的“客体”的倾向就颇为强烈。

只要抱定西方近现代文明引导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观，这个主体化、客体化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定位于主体，将东方定位于客体。结果大部分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作为主体，将中国看作客体，不加疑问地把自己置于优越地位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并不断强化这种倾向。

第三个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将自己置于研究客体之优越地位，说明其思想根源中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发挥着作用。这种情况下，就象科学实验室那样，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有意识性的行为在方法论上被割断了。即使没有完全割断也是极端微弱的，因此产生了可以忽视客体影响的方法论上的“歪曲”。

上述方法论的“歪曲就表现在现代中国学中出现的各种东方主义现象。当然这种东方主义是中日两国间的“共同主观性”的“歪曲”，因此并不只有日本人处于这种歧视构造中，成为客体的中国人同样也身处其中。正如沟口雄三所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了对抗西方现代化而走上了某种意义的“反现代”道路，其自身就包含中国与东方主义中的歧视构造纠缠在一起的寓意。正是这种对东方主义的诅咒，才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⁴²

总而言之，大多数日本人“不看”、“没看到”日本战后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个现实（共同主观性），这种状况正是主体与客体被有意识

地割裂的产物。

更进一步说，日本的中国学者将自己置于研究对象中国之上，根据自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尝试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的同时，却无视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反向作用，这种方法论当然免不了只去评价对其判断有利的研究对象的倾向。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对研究对象的因果分析发生混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由此研究的“客观性”就会受到怀疑。如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中割断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意志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同主观性”一直在进行着双向互动和变化。对于这种目的意志，如果依据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优越地位为前提的方法论，就会造成忽视主客体之间“共同主观性”的双向变化的结果。

(5) 目的论的排他性与现代中国学的“客观性”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目的论在研究者或研究团体之间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产生对立和冲突。过去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出现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的对立就是一例。

目的论上的分歧如果发展到互不妥协的地步，一般，会形成学术性的学派团体，以在内部加强为本派的目的论进行辩护的意识，但是，即使在因果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在修正本派的目的论上有所发现，也很有可能忽视甚至无视这种发现，容易产生为了适应目的论而进行因果分析，即将目的论与因果论相混同的弊端。

过去，抱有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立场相近的目的论的研究者，与批判日本追随美国、维持对华“战争状态”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亲华”、“反华”这两种极具排他性立场的对立情况。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亚洲政经学会和现代中国学会之间的不同立场即为一例。⁴³

前者为了将日本追随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予以正当化，倾向于认可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种目的论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揭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推动革命外交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失败和阴暗